

赵新良/主编

# 辽宁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研究

LIAONINGSHEHUIZHUYI  
XINNONGCUNJIAN SHEYANJIU

辽宁人民出版社

赵新良 / 主编

# 辽宁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研究

LIAONINGSHEHUIZHUYI  
XINNONGCUNJIANSHEYANJIU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赵新良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赵新良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6.8  
ISBN 7-205-06016-8

I.辽... II.赵... III.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研  
究—辽宁省 IV.F32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583 号

---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6mm × 208mm

印 张: 19.375

字 数: 37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丽竹 姜 瓠 伯 灵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蔡桂娟 侯俊华

---

定 价: 46.00 元

## 编委会

---

主 编/赵新良

副主编/李 经 李戈军 张 犁 邴志刚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艳竞 马 威 王振宇 刘焕鑫

陈 萍 陈德刚 李衍军 李忠国

孟炜中 高春生 陶承光 徐 岩

郭明顺 韩东太

## 前 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党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总览全局、着眼长远的历史性选择，体现了党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和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关心，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进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惠农政策的延续和集成，与历史上一些好的农业政策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安排、人本精神一脉相承。然而，新农村建设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的一些农业政策的新集成总部署，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时期“三农”工作的总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很多新的内涵，还存在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新农村建设具体到辽宁，可以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我省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了基本条件；正在实施的老工业基地振兴，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全省城镇

化程度比较高，农业人口相对较少等都是我们建设新农村的有利条件。同时，耕地和水等资源短缺（人均占有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体制和机制性障碍较多等因素也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挑战。所以我们有必要针对辽宁实际认真研究，努力探索我省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我们试图思考这样一些带有前沿性的问题。

##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竞争

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经济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洪流，创造了我们引进先进技术、借鉴先进管理体制、学习先进管理理念的大好机遇，给了我们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享受后发效应、发挥优势、加速振兴的大好机遇。然而面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对经验丰富的竞争对手，面对羽翼丰满的跨国公司的世界行销网络，我们的农村经济大步踏上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轨道，必须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切实提高农民、农业、农村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一要讲特色经济，讲比较经济效益；讲性能价格比优势；二要讲核心竞争力经济，讲以自主知识产权构建的核心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讲集成创新建树的知名品牌优势和市场诚信声望，讲质量认证、管理认证、环保认证等无形资产的有形竞争优势；三要讲规模经济，讲聚集效应、组合优势，讲生产要

素最佳配置带来的整体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四要讲行销网络、信息经济，讲现代物流配送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门到门的服务，讲网上交易、电子货币结算的便利快捷；五要讲效率经济，讲时间价值和最优服务半径，讲期货交割、金融汇兑的风险和虚拟经济的实在收益，如此等等。也许小农自然经济时代积累的经验、计划经济和管制经济时代积累的经验、混合经济双轨制时代积累的经验都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的业态和交易规则，我们相当一批农村领导干部和经营管理人员真要补一补 MBA、EMBA 的课程。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看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大潮之中，辽宁本土文化特有的“高举、紧跟、照办”、“唯上、唯书”、“喊口号、搞形式”等一套传统思维定式和工作模式，虽然不再居主流地位，但是浮躁浮夸、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等问题和倾向在一些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不高度重视、当头棒喝、对症下药，深恐念歪了经，走邪了路。

## 二、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自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多元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自觉呢？

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写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

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他说，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层面上认同文明。冷战之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

德国学者米勒写了一本《文明的共存：对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他说，现代化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很难和这种快速的变化达成一致，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就铺天盖地地袭来。现代化打破了缓慢的文化进化过程，促使它飞速前进。文化的惯性虽然很大，但它还是无法经受住现代化猛烈的、强制性的冲击。所有文化都被卷入快速并且是痛苦的转变漩涡之中。相互影响作用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使文化交流具有“普及推广”的必要性。

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强力冲击，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我们可以先听听名家的意见。

德国前任总理施密特在他的《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说，我国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征。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在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不把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东西传递下去，我们所能传给后代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而且一旦全球化腐蚀掉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

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娱乐工业的全球化迫使我们大力进行自我教育，以此来保护我们传递价值和文化成就的能力，以及进行自我创造、取得新成就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

《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载，汤因比认为：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没有提高，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的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这跟道德上的或伦理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池田大作说：人的道德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反而有所降低。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从技术进步所获得的力量，可以代替道德所完成的任务。从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是解决人民自己招致的现代危机的出发点。要从一个人的意识深处加以要求，对人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我国学者高度重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历史重任。他们说，当今世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错位，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导致道德沦丧，人际关系紧张和信仰危机；过分追求财富积累，破坏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蕴藏着深厚的伦理道德遗产和仁爱关怀的儒家文化，在未来人类伦理道德的重建上，将产生重大作用。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积淀下来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兼容并包”的开放意识、“与时偕行”、“革故鼎新”的思想等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中国人民迎接挑战、变革创新、开拓前进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厚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审美相通、圆融、合于一境的“自然神韵观”，人与自然整体浑融的“情景交融境界”，不走极端、和平纯正、合于礼教规范的温柔敦厚、讲究节制、含蓄、冷静、平淡的“中和之美精神”，道德审美和审美道德化、历史审美的道德化、审美兴趣的道德制约等范畴下的以善为第一的“审美观念”，关注下层人民及民生以及社会稳定关系的忧患、请命，表现社会疾苦的“民本主义”审美意识，仁义、正统、务实、爱国、自强、乐观的“仁性人格审美理想”，整体观照、直觉妙悟的审美把握方式，对偶平衡、圆环扣联结构的、重复稳定的程式，重表现以意为主的经验审美图式，重教化的陈词对话的审美接受意识等等，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建构现代化、全球化背景的人类文明仍有积极意义。

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无视自然力的技术崇拜倾向。当代技术决定的艺术形式往往表现出审美与自然生态与民族人文生态的脱节，展示出现代人对自然和他自己的自然力量的控制；仅仅因为对不可直面的欲望的象征与想象，审美在通过反自然与反自性的寻找自由的过程中，导出了一条与危险共舞之路：审美与艺术共谋，在世俗化中伪造激情。

俞吾金的《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一文说，我们必须在生态学的语境中重新阐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历史作用。那种把科学技术与绝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简单地等同起来的见解，不过是启蒙时代留下的遗迹而已。尽管现代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也使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一言以蔽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中蕴涵着一种支配统治人和自然的盲目的力量，这使我们必须终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的肤浅的谈论，而把问题的核心转移到对其历史作用的界限的关切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明确提出把文化自由摆在人类发展的中心地位，“文化自由作为人类发展的重要部分，国家应当采取行动并予以关注”。我国专家提出，各级政府要在五个方面保障公民实现文化权利：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个人对自己的文化

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保护权，进行文化选择的权利。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发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潮中出现了三种文化偏差：一是高度重视场馆硬件建设，有意或无意忽视文化遗产，甚至贬低民族文化、迷失自我；二是高度重视环境形象工程，热心栽大树、铺草坪、建广场、盖洋楼，有意或无意忽视弘扬民族建筑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懂得深入挖掘传统民居建筑物质文化、意识文化、制度文化的民族根、地域魂；三是高度重视资源开发、经济增长，有意或无意忽视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重蹈人类中心主义覆辙，不懂得天人合一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依生、整生、共生之美。

###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动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就在制度安排上决定了一次分配讲求效率，二次分配讲求公平，三次分配讲求爱心；决定了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运行，配置资源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辅之以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的规制。

从哲学的角度看，社会的发展，应当有“终极价值”来为社会发展标明方向，调动全体社会成员求发展的动力。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终极价值由人民决定，而最适合作为终极价值的，不是别的，

正是由马克思表述的“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社会,必然要积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提供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善事物,主要是富裕、和谐、自由。而一个社会对富裕、和谐、自由的追求,就是对人的各种内在需求的迫切追求,就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际推进。富裕能为和谐与自由提供好的物质条件,和谐能为实现富裕和自由提供有利的社会制度,而自由既能为实现富裕提供动力,又能为社会和谐注入旺盛的活力。

我们主编的《构建和谐社会: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环境目标》一书提出:从管理学角度看,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人的需求的概括作出的人性假设,在管理思想演变历史中,适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时代诉求,人性假设先后经历了“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文化人”假设和“生态和谐人”假设四个阶段。

经济人假设是一种效率管理哲学。经纪人假设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是个人行为的根本动机与根本出发点。社会人假设意味着管理哲学的新转向。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人的心理、情感等社会性因素将从根本上影响员工的劳动积极性。文化人假设重视组织的文化建设,强调文化在组织管理方面的特殊功能,强调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价值观、组织精神、组织使命和组织形象的培养与塑造,组织行为的效率主要根

源在于组织内群体成员是否具有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生态和谐人假设,是指以身心和谐、人生幸福为目的,人的需求结构以和谐发展条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自然有机性的生态和谐,环境适应性的协变和谐,价值合理的臻善和谐为契机的人性假设。生态和谐人假设强调管理的客观性、科学性与人类引为感受的主观性、情感性的有机结合与互动,组织的发展须臾难离环境影响。管理应当遵循这样一些管理规范和管理原则:生态和谐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维效益观;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综合安全观。以生态和谐为价值取向的考核体系、绩效评估、分配制度、激励和约束机制、学习型组织、信息网络,可进一步强化组织的生态和谐的文化氛围,使生态和谐人的养成卓有成绩。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分配机制和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极其重要的环节;社会活力的激发原则、激发机制和激发格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极其关键的环节。而分配体制与社会活力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具体性的意义和战略性的作用。这就需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人力资源收益的最大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使优秀的党政人才、社会管理人才有用武之地,使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有发挥

作用的舞台，使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实用人才脱颖而出。加快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通过体制创新，实现人才配置的市场化；通过机制创新，实现人才开发的多元化；通过能力创新，实现人才价值的最大化，实现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的营造。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品和服务的合理定价机制、产权的明晰和使用权、经营权、交易权的科学规制，是调整供求关系、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向和规模、激励管理者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努力加强经营管理、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积极性以提高经济效益的强有力的经济杠杆和确保长治久安的定心丸。如果山权、林权、水权、矿权等等都能确权和合理定价；如果非义务教育权、非公益事业营运权、收费公路的使用权等等都能够确权并通过听证会、供需双方磋商机制等形式确定合理价格，使经营者有可观的经济收益，使消费者有可以承受的付费标准，就会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经营，让度交易；使广大农民期盼解决而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无力解决的大批难题，找到市场化运作、工商管理手段应用、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健康发展的宽广渠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找到经济的动力、社会的动力、人性的动力才会成为亿万农民群众声势浩大、历久弥新、讲求实效、健康理智的创新、创造、创业的伟大历史实践。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初步实践中，已经出现各级领导层层向下发动，各基层组织层层向上申报项目争取投资的倾向；已经出现基层组织要求知名企业家兼任乡村领导职务进而抽取企业发展资金兴办地方公益与非公益事业的苗头；已经出现某些领导干部的零地价、零收费出让公共资源和财产使用权、经营权作为吸引投资、大上项目的“法宝”、“绝活”，且有相互攀比之势。

#### 四、政府角色转换后的建设主体、 投资主体

我们正在逐步启动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对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认真研究三个问题：一是政府转型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公平地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农民享受改革成果的问题，已经成为矛盾的新热点；二是政府转型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收入差距比较大、城乡差距比较严重、公共医疗和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问题比较突出，以及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等问题，完全靠市场机制是不可能妥善解决的，在“市场失灵”之时更需要政府勤奋工作，在制度安排上有正确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调节机制；三是政府必须管什么和怎样管的问题。普遍的共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

分开，政府从一些只有市场主体才能进入的领域中退出，向全体人民包括全体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组织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养老、国防、外交等公共服务事业；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作用，推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各级政府抓经济发展，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领导经济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增强按国际通用规则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增强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的意识和能力。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整合行政资源，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依法规范对事业单位的授权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健全社会公示、社会听证等制度，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农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各级政府仍然应当坚持“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改革取向，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执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保公平竞争；实施宏观经济调节；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和提供公共福利设施。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通过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把部分竞争性、经营性强的传统公共产品交给股民去投资，减轻政府过重的财政负担；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形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